考古人類學刊・第 71 期・頁 47-69・2009

戰火下的記憶政治：金門，1949-2008*

宋 怡 明**
李仁淵 譯***

摘 要

1949 年，在台灣海峽的小島金門成為退居台灣的蔣介石國民政府及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相互對峙之軍事前線。在全球地緣政治的對抗，以及中華民國反共的高度象徵下，金門變成歷史上高度軍事化的社會之一，一個居民的日常生活直接受到國際地緣政治影響的地方。今日，儘管軍隊已經大量撤出，軍事化與地緣政治化之結果仍然持續地遺留下來。

本文嘗試探討當前金門社會的記憶政治。藉由四種明顯的論述來討論軍事化與去軍事化經驗如何被回憶，包括正式紀念的官方論述、以及三種社會論述：英雄記憶、苦難記憶與鄉愁記憶。每種論述由不同的當代政治論爭展開，涉及的區域包括金門內部、金門與台灣、金門與中國大陸。這些討論過去的記憶方式與金門的現在及未來高度相關。本文將討論地方行動者如何以策略性（entrepreneurial）的方式來操弄集體記憶，雖然他們仍受到集體記憶的慣性所限制。我將進一步指出，大眾的記憶並不一定會顛覆官方記憶，因為官方記憶並不固定，而是由當代政治現實所構成，顛覆性的記憶亦然。

關鍵詞：集體記憶、記憶政治、金門、冷戰史、軍事化

---

* 感謝金門技術學院江柏煒教授和戚常卉教授，台灣大學林瑋嬪，哈佛大學博士生李仁淵以及所有金門受訪人的幫助。

**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教授。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71:47-69・2009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a Geopolitical Flashpoint: Kinmen （Quemoy）, 1949-2008

Michael Szonyi*

trans. by Ren-yuan Li**

ABSTRACT

In 1949, the small island of Kinmen （Quemoy） in the Taiwan Strait became the front line in the military standoff between Chiang Kai-shek's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and Mao Zedong's People's Republic, a flashpoint of global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 and a powerful symbol of anti-Communist resolve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and its allies As a result, Kinmen became one of the most highly militarized societies in history, a place where daily life was inexorably connected to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s. Though the soldiers are largely gone from Kinmen today, militarization and geopoliticization have left enduring legac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litics of local memor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t argues that the experience of militarization and demilitarization is remembered through four distinct discourses: an official discourse of commemoration, and three social discourses: of heroic agency, of victimization, and of nostalgia. Each of these discourses is deployed in a variety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truggles, within Kinmen, between Kinmen and Taiwan, and between Kinmen and the mainland. These ways of remembering are thus as much about Kinmen's present and future as about its past. The paper argues that local actors make use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entrepreneurial ways, but their ability to do so is constrained by the inertia of collective memory. Furthermore, popular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emory is not always subversive of official memory. Because what constitutes official memory is shaped by the current political reality, so too is what constitutes subversive memory.

Keywords: collective memory, politics of memory, Kinmen, Quemoy, Cold War history, militariza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之間，金門是世界歷史上軍事化程度最高的社會之一。1949 年的古寧頭戰役之後，這一小群島嶼成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政軍僵局的前線、全球地緣政治的衝突點，中華民國及其盟邦反共決心的有力象徵。駐兵數字比老百姓人口還多；全民被編組為民防自衛隊，並強迫支援正規軍隊的需求。日常生活無可遁逃地與國際地緣政治連結。家庭生活、地方經濟，甚至是宗教、教育等，都繫於遙遠的某地所做的決定。由於處於第一次（1954-55）與第二次（1958）台海危機的核心，在地緣政治相關諸多課題上金門已受到不少注目，諸如美國外交政策史、中蘇與中美關係，以及關於現實主義（realism）、軍事威嚇（deterrence）與戰爭邊緣策略（brinkmanship）的理論研究。[1] 我的近著《冷戰島嶼：前線金門》（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2008）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金門，將金門視為鑲嵌在一個更大的世界框架中的人類社會，討論島上居民如何經歷這些戲劇化的事件（亦見 Chi Chang-hui 2000）。雖然今日金門軍隊已撤走大半，軍事化和過去地緣政治的重要位置仍對現代的金門有很大的影響。

在這篇論文，我探討當代金門社會的記憶政治（the politics of memory）。我認為軍事化和後續的去軍事化經驗在金門以四種不同又互相交疊的論述被記憶著。它們包括官方的紀念論述，和三種民間論述：英雄論述、苦難論述與懷舊論述。每種論述都在當代各種政治衝突中開展。各種回憶的方式因此不僅只關於金門的過去，也同樣與金門的現在與未來相連結。我將以金門近來兩個重要的歷史階段中，記憶所扮演的角色來探索這些議題。第一個階段是 19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政治運動期，其次是 2001 年以後的當代金門。對於第一個階段，我使用的材料是當時的文獻、期刊報導與參與者的回憶錄。第二的階段我採用我自己在 2001 年之後所做的訪問、地方學者收集的口述歷史，以及金門居民在報刊上所發表的文章。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探索記憶論述的操作及其與政治議題之間的關係。我的論點分為三部份。首先我討論記憶論述（discourse）本身的內容，以及這些內容如何隨時間而發展。透過這些討論我希望能呈現出多種，甚至互相衝突的記憶論述如何彼此合作，以配合當代的利益需求。其次，我主張地方行動者策略性的使用集體記憶，這裡「策略性」指的是英文的 entrepreneurial，而非 utilitarian 的意思，意指當地人會「盡可能的」運用記憶來爭取他們的訴求。但我同時也認為這些策略性的使用方式本身仍受限於記憶本身的慣性（inertia），而無法無限制的擴展。第三，我認為將官方記憶視為是合法化當代現實的工具，以及將民間記憶視為必然具有政治顛覆性的這種論點（Bodnar 1992），事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過度簡化了記憶政治的各種可能性。當政治現實改變，什麼是顛覆性的記憶也同樣的不再固定。更進一步的來說，本論文嘗試從新的世界社會史的角度來思考冷戰，並期待對此議題做出貢獻。此一新的研究作法一方面奠立在地方研究，另方面也留意各不同的地方之間的相互連結。雖然我接受的不是人類學家的訓練，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希望人類學家也覺得這樣的觀點有幫助。

人類學一向對人類如何感知世界感到興趣，也包括了對於過去的感知。近來許多不同領域，如社會學與我自己所屬的歷史學，對於「記憶」相關的課題興趣漸增。後現代主義對客觀歷史與主觀記憶之分界的挑戰在這些學科領域中引起不少回應（Olick and Robbins 1998）。雖然寫在歷史與記憶之間的區別仍相當清楚的年代，Halbwachs（1992）的作品對記憶的討論仍相當有用。Halbwachs 的作品顯現了雖然記憶的是個人，但是社會群體決定了什麼被記憶。集體記憶因此必然具有選擇性，且為當代的需求所形塑。如同 Geary（1994：12）所言，所有的記憶都是「為了什麼的記憶」（memory for something）。

雖然許多學者使用像「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或「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這樣的詞彙，我認為這些詞彙無法合宜的描述共享的歷史記憶如何運作。[2] 我們必須留意關於過去的記憶不是一個穩定的整體，而是為人所建構。這兩個詞彙也無法捕捉一個單一群體（乃至個人）對於單一事件可有多種乃至於相衝突之記憶的事實。再者，我們也無法確實知道人們的記憶，而只能知道人們如何訴說自己的記憶。因此我認為把對於過去的集體認識想成是各種論述會有所幫助。無論是個人或是集體的回憶，這些回憶能讓研究者感知是因為它們被清楚表述出來。這通常是因為這些回憶被策略性動員後的結果。另一方面，記憶也非純粹是論述。記憶通常不是為了服務純粹工具性的目的而憑空捏造。當記憶成為集體記憶後也不會停止變為個人記憶。因為這些考量，我將使用「集體記憶論述」（collective memory discourses）這個詞彙。所謂「集體記憶論述」是一群人共同認為真實的、對於過去的陳述總體，它可被動員來支持當代特定的政治立場。本文將探討論述本身之特質、其被動員之策略、其所傳播之管道、以及其被使用之場合的重要性。

官方記憶、苦難記憶與英雄記憶

這些記憶的開展場合之一是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一系列的政治活動。不像台灣本島，金門直到 1992 年才解除戒嚴。在這之間，來自金門的政治運動者運用台灣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島較開放的政治空間來鼓吹金門解嚴與解嚴後對金門的特別政策。在本節我將討論於這個時期中，從各個事件所開展的各種記憶論述。

在 1987 年台灣解嚴之後，「金馬團結自救會」的成員組織示威遊行，要求政府必須也要解除離島地區的戒嚴令。此團體發表了一篇宣言，陳述一系列的不平，主要關於過去民防隊強迫徵召金門人，以及軍事活動對他們生活諸方面的介入。1989 年立法委員選舉，該會領導人、年輕記者翁明志代表民進黨在金門參選。當局因之將他列入黑名單，禁止他回到金門。翁明志與其他人於是在台北組織一個「違禁品展覽」，諷刺政府將籃球或收音機等日常用品列入違禁。隔年，一群在台灣的金門年輕知識份子，在幾個較資深的記者的背後支持下，創辦了《金門報導》，主張政治變革。這份期刊雖然被禁止帶入金門，但在旅台金門人士間流傳，成為反政府言論的論壇。它的頭幾期刊載了當地人在戒嚴令底下苦難故事與光榮服役的故事。其中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則當地中學老師的回憶，講述金門人在 1958 年砲戰的經驗和之後所受的苦難（洪春清 1993）。[3]

1991 年中華民國政府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金門的政治活動再次興起。幾天後，國防部聲明戒嚴令在離島仍繼續實施。經過多年經驗的積累，反對陣營立即採取反應。一個新成立的外圍組織宣佈在立法院靜坐。他們的訴求包括立即終止戒嚴令、金馬回歸憲法統治、保障基本人權、取消軍事化的戰地政務管理，以及縣長直選。在接下來的十天，擔心台灣當時的政治變動會轉移大家對金門處境的注意，示威者運用許多政治行動來吸引人們對金門的關注：一群女子自衛隊員焚燒自己的制服；示威群眾在遊行隊伍中豎立了唐代陳淵的芻像，希望這位開闢金門的「恩主公」可以幫助他們的政治抗爭。

1992 年金門的戒嚴令終於廢止。然而這並未終止金門的政治運動。1993 年紀念八二三砲戰三十五週年的遊行中，金門人要求對戰爭時期的補償。其宣言道：

> 從古寧頭戰役、「八二三」砲戰，迄今，我們為了國家安全、為了保障台澎的安定與繁榮，許多鄉親的生命因無情砲火而傷亡犧牲；更有許多鄉親被徵召以義務勞動、民防隊、搶灘、運補彈藥……〔提到「六年國建」等經濟建設計畫〕……而金門呢？依然是「戰地」；依然是「前線」！依然是民生困頓、百廢待舉的金門。……而金門呢？為國家付出無數犧牲的金門呢？（楊樹清 1998：99-1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這種種政治行動中至少有三種記憶論述在操作。異議人士動員兩種重疊，但卻可清楚分別的記憶論述來反對官方對金門歷史的論述。一種將金門人再現為受苦的被害者，第二種將金門人再現為英雄。讓我們依序討論這三種論述。

異議人士有意識地在官方論述當中挪用部份元素，而拒絕其他元素。在戒嚴時期之對內宣傳中，金門民防隊被塑造為國家的英勇保衛者。政治異議者襲取這個影像，轉為己用。在戒嚴晚期，官方以數個紀念古寧頭戰役、八二三砲戰與烈嶼保衛戰的紀念館，建立起一種更精緻地呈現金門歷史的再現形式。如同江柏煒（2007）所指出的，透過一套更精心策劃的「展示政治」（exhibitive politics），這些紀念館將軍事威權合法化，鼓勵愛國情操與自我犧牲，並劃清中華民國「自身」與共產主義「他者」之間的界線。它同時強調了共產顛覆的危險，因而需要不斷地團結與警戒。這種意識形態設計與當時中華民國變動的政治局勢有關，此時國民黨面臨國際支持的衰退與內部挑戰的興起。此意識形態設計大多透過讚頌個別軍人的英勇表現來完成。然而紀念館忽略當地人的真實體驗（也同樣忽略當時眾多從台灣徵召服役的軍人），金門居民在這些紀念館中幾乎全然消失。其實,官方出版品、學生課本、宣傳品、與展覽館的展覽等再現官方論述的媒體本身也是變動與多元的。不同時代、制度與機構都會製造不同版本。官方論述的複雜性用對抗的論述不足以談清楚，因為它牽涉到不同版本的製造者，以及不同版本的整個製造、分布、與作用狀況。如果想要很完整的描述金門歷來的記憶政治，必須討論不同文本本身，以及它們互相之間的矛盾與縫隙。由於篇幅有限，在本篇論文只能做很簡單的描述。[4]

這些政治運動的核心在挑戰中華民國政府對歷史記憶的壟斷。這個過程與 Kwon（2006）描述的越南有諸多相似之處：在越南，對於戰爭的紀念亦逐漸從國家轉移到私人與公共部門。異議人士在他們的政治活動中動員兩種相重疊的記憶論述以批評官方的版本，並支持自己的利益。首先是苦難的論述、受害者的記憶。其次是英雄行徑、為國貢獻的論述。兩種論述都不是政治運動者憑空創造，而是都已在金門人當中廣泛流傳。這在已出版的口述歷史，以及我自己的訪談中都已經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讓我們先看苦難論述。當翁明志展示這些違禁品時，他目的在喚起並動員這些過去加諸於金門人日常生活上之種種荒謬限制的記憶。《金門報導》上關於砲戰下的死傷、為軍事用途強佔私人財產、逮捕間諜疑犯的居民等故事，亦以同樣的方式動員當地居民的集體記憶。1993 年的宣言也以當地人民的困頓達成同樣效果。苦難記憶又可以分成兩種類型：戰爭創傷的記憶，與因國家行動（如軍事管制）而來的苦難記憶。在對古寧頭戰役的記憶中，這兩種類型的記憶互相重疊。一位年長的受訪者噙著淚水，向我敘述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父母在戰役開始時如何從古寧頭的家中逃出：

> 當我們回來的時候，我們的房子被清空了。所有的東西都被偷走。當我們來的時候，軍人看管我們的房子。他們拿著刺刀指著我們，問我們要幹麼。他們不讓我們進去……我們當時有兩棟房子，是用從菲律賓來的匯款蓋的…他們毀掉了我們原來漂亮的房子，我……已無法再多說什麼了。[5]

除了整棟毀掉或充公的房子之外，人們對某些特定被拿走的財產（如木門）有強烈的記憶。其他特別被記得的物件，則包括那些可以將講述者本身置於個人歷史，或者家庭、村子裏的物件。「有的碉堡用墓碑，百姓抱怨也無法」。[6] 更慘的是，有的祖先牌位被毀掉，可能都被被當成燃料燒掉了。「現在我們連自己祖宗的名字都不知道。」[7]

另外還有一些回憶與直接了當的竊盜與侵佔，而非因防禦用途而充公有關。「阿兵哥愛拿啥就拿啥」，「部隊將田裡的作物偷走了，讓我們種田白費工夫了」，「那時國軍有三樣不要，看不到，拿不動，不值錢不要。」在古寧頭戰役後數月的艱難處境，這些佔奪可說是劫掠，但部份也是因為走投無路。但對那些房子被清空、農作在未及收穫即被拔走得村民來說，這些並沒有差別。一位農民說：「說好聽是服務民眾，說不好聽就像作奴才一樣。」[8]

無論是兩次台海危機時的密集轟炸以及之後數十年的隔日砲擊，關於砲戰的記憶通常很公式化且去個人化。中華民國政府欲將砲戰連結到共黨殘酷本質的宣傳努力對民間記憶幾乎沒有影響。除了執行地面任務（如運送軍需或傳遞訊息）的民防隊員之外，其他多數人被問到當時情況首先想到的是開始的驚慌、防空洞裡擁擠骯髒的環境、以及維持自己與家人生活的努力。

> 在防空洞裡每個家庭有自己的地盤。在哪裡什麼都不能做。老太太多半嚇壞了。她們只能坐在那整天發抖。老人求神求祖宗保佑，但是沒有用。無論你有多少祖宗，砲彈就是一直落到東、落到西…每個家庭都在外頭挖一個洞，把尿壺帶出去倒在裡頭。裡面真是很擠，幾乎沒有空間可以坐下。我們在地上鋪一些板子躺在上面。每個人都嚇壞了。[9]

人們也談到對國家與其地方單位的怨恨。「那時任務隊只有義務，根本沒有權利，沒有好處，連每日三餐都要自己解決。叫你做工，你就要做，叫你去出公差，你就得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能有遲疑，否則軍法侍候。」人們記得他們在被強迫勞役之下的艱苦情形，「一旦出任務，吃的米都是用挑糞的桶子運過來，我們吃的時候只好捏著鼻子吞下肚子就是了，否則怎麼有力氣執行任務？」嚴厲而無理的處罰也是地方記憶的重要部份。孫炳樹去民防總部時沒有繫上制式的黑皮帶：「當場就被打，之後還送到民防總部館三天禁閉。」即使是沒有親身經歷這些處罰的人也記得這些處罰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那個時候，如果他們要找你的麻煩，就把你給銬起來」、「若是不能夠在 30 分鐘之內趕到（民防隊集合地點），還要關禁閉，並且貼上匪諜的標籤。」[10]

共黨顛覆的危機感，以及從此感受產生的監禁與恐懼的氣氛，也是許多人回憶中的一部分。「隊中有國民黨指派的政訓員，暗中監視著我們的言行舉止，絲毫沒有言論自由，稍對上級有甚麼不滿與抱怨，就會被認定是間諜或叛者。」、「我們很害怕。我們不敢說出來。」[11]

有些苦難的記憶只有經過一段時間才有完整的意義。即，這些記憶的重要性只有當他們被歷史化（historicized）之後才顯現出來。民防隊員被要求保持一定存糧。因為這些存糧通常來自過期的軍糧，當糧食到村民手上時通常過了好幾年。「這些米總是發黃、長霉。長官告訴我們這是因為米加了維他命」，為了避免浪費，村民從最久的存糧吃起，因此新送來的米通常還要多存幾個月才被煮來吃。[12] 1996 年一項醫學研究指出，馬祖的死亡率與台灣差不多，但是死因為癌症者明顯較高，而癌症的發生率歸結到米儲藏過久後產生的黃麴毒素（楊樹清 1998：142）。雖然在金門還沒有類似的調查，許多金門人相信在戒嚴時期他們的健康遭受長期威脅。

將這些記憶連結在一起的主題是「苦難」。這些苦難記憶是關於金門百姓受到各種欺侮，有些來自他們的共黨敵人，但更多來自中華國民政府、軍事管制、以及民防軍官。這種模式將居民再現為無力改變其命運的被動受害者。他們的記憶以一種全然負面的角度，將他們承受的苦難與不是他們製造出來的政治衝突連結在一起。

苦難論述與另一套相衝突但並存的記憶一起開展。在每個歷史時刻，當金門人被他們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操控時，會有另一個相反的記憶把他們放在事件的中心，強調他們自己的英勇行為、機智與堅決。例如，當金門女性焚燒她們的自衛隊制服時，她們在喚起她們共同防衛國家的記憶。1993 年的宣言說的更直接：「而金門呢？為國家付出無數犧牲的金門人呢？」

如同世界上所有人，金門居民以其社群的價值與世界觀來解釋他們的歷史。在這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版本的歷史，1949 年古寧頭戰役共軍不是因為補給與增援不足的問題而敗退，而是因為神的介入將共軍的船隻吹離他們原先預定登錄的地點，又以巨浪讓他們擱淺，使得國府部隊得以殲滅他們。[13] 在這種模式的記憶當中，反諷、幽默與性暗示扮演重要的角色。當老人們聚在一起聊戒嚴下的經驗時，一個共同主題是早期軍人與百姓之間因為百姓國語不標準而引起的誤會。故事之一是胡璉將軍下令軍車讓百姓搭便車時，他說：「『你們只要舉手車就會停下來』。老太太的國語不標準，她們想說『阿兵哥，我可以坐你的車子嗎？』，卻說成『我可以做你的妻子嗎？』」[14] 這種模式中，軍人想要作弄或嘲笑村民總是產生反效果。如同一個知名的故事，一個老太太要一個軍人教她如何以國語說「謝謝」，而軍人教她說「王八蛋」。然老太太第一次有機會用這句話是對金防部司令胡璉大聲致謝。[15]

地方居民的機智通常可以讓他們打敗中華民國政府與軍官。例如在 1949 年禁漁之後，大部分漁船拆毀，表面上的理由是作為防禦工事的原料，實際上的理由可能是為了防止士兵逃回中國大陸。然而最終漁禁還是取消了。老漁夫對此的解釋是：當時封禁「情況對我們漁民很艱難。有一次，幾個漁民偷偷出去捕魚，把補到的魚給司令官吃。司令官是從中國內陸來的，從來沒有嘗過新鮮的魚。他吃了以後覺得這真是太好吃了，所以准許我們繼續捕魚。」[16] 為了應付對宗教活動花費的限制，村民學會以「勞軍」、娛樂軍隊之名請劇團演戲。[17]

在村民的回憶中，他們擅於透過操作愛國語言對抗國家的控制與限禁。有一個人回家的時候，因為超過宵禁時間在路邊被攔住。他告訴衛兵說他因為看國父傳電影，才不得已那麼晚回家。因為他們不能在這類的電影中途離席，因此衛兵只好讓他通行（迎曦 2003）。這些小勝利通常是因為地方居民要比軍人聰明許多。「又如果軍隊要建碉堡，也會要求百姓捐磚頭，有時實在找不到這麼多的磚，就趁著中午阿兵哥忙碌的時候跑去拿回來交。」[18] 其他的回憶則集中在居民的大膽冷靜，像是一則故事提到在 1958 年危機時，民防隊利用艦隊卸載的時間偷喝原本要給美軍顧問團的啤酒。[19] 這些有趣的小故事常常出現在《金門日報》的副刊當中。但同樣類型的故事也常常出現在口述歷史當中，證明這不是只是特定文類下的產品。

民間記憶以民間世界觀與民間價值詮釋歷史事件是很常見，甚至是普遍性的現象。同樣普遍的也是民間記憶所具有的協商與抵抗性質，他們是兩種弱勢者的傳統武器。然而金門記憶模式所不同的是：它將百姓的行為不止歸因於個人具有的主動性，同時也具有地緣政治的意義。換言之，在這種模式的記憶中，不只是地緣政治影響他們的生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們的生活同時也影響地緣政治。他們將自己面對共黨侵略的勇氣記憶為地緣政治中國共內戰、兩岸關係，與更高層次的國際冷戰的重要成份。這樣看來，古寧頭戰役與兩次台海危機的砲戰被記憶為他們的重大勝利。一位從大陸撤退、後來定居金門、娶了當地寡婦的榮民這樣回憶 1958 年第二次台海危機的八二三砲戰：

> 毛澤東說，如果他們拿下金門，台灣就不可能守得住...八月二三十日他們開始開火。我們這邊已經準備好了、砲彈上好，但是我們沒有開火。我們在等待命令。他們的大砲很弱、砲彈掉到海裡。我們不害怕...我們趕走他們的飛機。他們損失的比我們多得多。他們的死傷也比我們慘重得多。我們只損失了一艘登陸艇，而他們損失很多艘。二十天之後，他們還是沒有得勝。因此毛澤東被迫下台，劉少奇取代他。是劉少奇決定單打雙不打...我們真的很累了。如果你作戰兩、三、五個鐘頭，你會精疲力盡。你是美國人，你會去看心理醫生。但是我們戰鬥了二十天。我們實在非常的累，但是我們打敗了他們。[20]

在島上大家普遍認為「單打雙不打」是因為共軍無法取勝。換言之，不只是正規軍，而是老百姓值得這個勝利。「共軍開始每隔一天轟炸我們，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沒有辦法打敗我們。」，金門的不屈撓是「共黨的眼中釘」。[21]

在這個模式的記憶中，金門的存在對保全台灣意義重大。難道在 1950 年代共軍宣傳擴音器沒有大肆宣揚要「血洗台灣」嗎？然而金門人把他們拒阻在外，阻撓他們邪惡的意圖，而這讓台灣得以在相對安定之下享受幾十年的高度經濟繁榮。如同地方文史工作者董群廉這麼說：「八二三砲戰由於民防隊配合國軍作戰，才贏得八二三最後的勝利，八二三的勝利才使得台澎地區利用這幾十年來的安定，促進了它的經濟繁榮、社會的民主自由，台澎地區的這些成果與八二三砲戰的勝利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就這一角度來說，金門民防隊的犧牲奉獻就值得記上一大筆。」政府官員們走得更遠，強調金門在冷戰體制下的重要意義：「這是個戰略性的問題。金門是美國戰略考量的一部分。美國需要台灣在太平洋去圍堵共產黨，所以金門必須堅守。」[22] 金門人記得他們如何創造歷史，「金門曾全力捍衛台灣的自由民主，間接促進台灣經濟的發展」、「其實先有金門的軍事奇蹟，才有台灣的經濟奇蹟。」[23] 也許地方意識本來就蘊含每個地方有其獨特意義的看法。然而金門人所記憶的不只是金門是個特別，同時也是極重要的地方。在苦難論述中，對戒嚴時期的記憶是痛苦、不公平的對待、任意的徵收與處罰，在行動論述中，對同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期的記憶是居民的英雄主義、英勇行為與對國家整體的愛國貢獻。

我們已經見到在政治運動的場合中，這兩種記憶論述如何用來反抗第三種官方論述。有些受訪者明顯的做出這樣的連結。當一個前民防隊員被問到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感覺時，他說：「（我）痛恨（他們）！我最不平的就是 823 時金門的百姓對政府付出那麼多，戰史館居然沒有我們紀錄，也沒有給我們妥善的賠償……多虧我們如此犧牲，才有現在的台灣。」[24] 我們也已見到這兩種論述如何更廣泛地在金門人中流傳。在 1990 年代早期，受難與行動的論述被動員來要求補償。1992 年在戒嚴令廢除的前幾天，翁明志向金門縣政府提出請願，要求賠償被佔有或損壞的財產、民防隊的強迫徵召、以及無論是共軍或政府所造成的身體傷害（翁明志 1994：53）。

金門居民這樣的要求與台灣居民向政府提出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迫害的賠償有關。一封《金門日報》的投書作者從在電視上的觀察開始，他看到「住在台灣本島的人民能有這樣的節目讓他們暢所欲言，尤其是二二八事件，每天還是有那麼多人，找來那麼多小故事談論不完。然而我們金門曾經歷過古寧頭戰役、九三砲戰、八二三砲戰，住在這裡的人，在砲火下出生入死、犧牲奉獻，台灣人有誰聽過我們的心聲呢？早年不敢說也不能說，現在想說的人也已經凋零老去，所剩已不多了。最近金門日報副刊，開闢了這片專欄園地，雖然無法和電視傳播媒體一樣，能快速傳播那麼遠那麼廣。但這片小園地總是一個可以讓金門這群經歷過無數次戰爭摧殘的老人，述說著我們如何在戰場上求生的驚險過程。在戰地裡忍辱偷生的日子，在晚年有一吐為快的地方」（翁雄飛 2003）。其他人要的則不只是說自己的故事：

> 回想我年輕時協助國軍馱運彈藥受傷，當時縣政府只發給 120 元，還有一包米作為慰問，說起來真是可憐。我們小老百姓也不敢要求什麼。後來台灣各種事件補償金陸續發放，我也才開始在村民大會提起當年往事。每次開村民大會，我就建議政府應該對因戰功受傷之人補償，但是上級只是紀錄紀錄，都沒有下文。[25]

我們可以看到翁明志等其他政治運動者與金門居民的努力，策略性的將個人記憶改造成可以用來動員、達到其政治目的的集體記憶論述。翁明志請願數年後，政府宣佈對受傷者的賠償，對地方歷史做出交代。雖然政府並未承認政治運動者在此決定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從提供賠償的類別正符合翁明志的請願內容來看，其中有明顯的連結。首先，居民可以要回當初被軍隊強佔或毀壞的土地財產。總共有超過八千筆要求。多數都已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提出賠償者有利的方式解決。軍隊必須與民眾達成協議，出錢購買、租借或者還回居民的土地。土地的問題並不難解決，因為當時正值軍隊加速撤軍，很多有問題的土地已經不為軍隊所用。第二種賠償是針對戰時死亡或受傷的百姓。不過只有被國軍所傷的居民可以獲得賠償，那些於五○年代在兩次台海危機為共軍轟炸所傷的人則無法獲得賠償。這一部分共有超過一百件賠償請求，部份以死者的名義，大部分為受傷。在取得賠償上，受難論述是重要的政治工具。

第三種類別的賠償是針對民防隊的強迫徵召。1995 年政府宣佈退伍民防隊員可以依其服役時間、經歷的危險與受勳的情形，換算成點數。這些點數再換算為賠償金額，領取金額不超過二十四萬五千台幣。全部總共有超過五萬人（包括馬祖地區）獲得賠償。前縣長陳水在估計全部的金額約在台幣六億元左右。[26]

有些服役的賠償請求仍未給付。成千曾在金門與其他離島服役的游擊隊員與前反共救國軍團成員仍未受賠償，明顯是因為若付給他們相當於軍事服務的薪資，花費將會過高。許多人仍對賠償的金額不滿。林永局的父親在 1958 年的砲戰因傳遞訊息而受傷，然而存活下來且一直活到 1990 年代。林永局要求受傷賠償，但被告知因為他的父親已經死了，即使他出示病例，仍無從估計受傷的嚴重程度。他覺得很不滿。「政府在認定上應不是難事，顯見法令之不合理性，未能真正落實對當年犧牲奉獻的民防隊員做補償的美意。」其他人則抱怨賠償給付不公。「當時公務員照辦公，照常領薪水，都沒有出操,居然跟我們一樣賠償，民防隊的冒死在做，只賠這一點。」[27] 儘管這些抱怨仍在延續，但主要的論點已經很很清楚：英雄論述與苦難論述在 1990 年初期被動員來要求服役賠償。以往官方紀念論述中隱藏或否認的部份現在已拿到檯面上。

日常政治與懷舊論述

從以上對記憶論述之政治角色的討論中，或許有人會認爲當賠償的問題大致解決後，這些論述會逐漸消退。然而這些記憶始終在金門人中流傳，不斷經由地方文史工作者、地方報紙上的文章、或是在人們的日常對話中出現。其部份理由，如同我之前提到的是：記憶從不純粹是工具性的，也不一定就是社會性的，他們也是地方民眾個人主體性的一部份。在政治活動之外，這些論述也持續地在更平凡的、日常政治互動中開展，特別是關於金門與其跟台灣、中國間變動的關係這部份。

在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初，這些關係由兩個主要因素所形塑。首先是海峽兩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係的變遷，使得金門軍事地位下降。大規模撤軍，以及軍隊撤去後，地方經濟明顯衰退。[28] 此時，當金門人更加希望在台北的中央政府能夠提供補助，與推動其他經濟發展方案時，這兩種論述通常被用來支持這些訴求。就職爲金門第一任民選縣長的時候，陳水在簡述他的任務：

> 就金門今後施政的重點，歸結起來有二大課題：
> 其一，是對累計四十年的民怨問題，必須加速解決與克服
> 其二，是對創造未來的理想金門，必須加速投資與建設。（陳水在 2001：97）

另一個影響台金關係的重要因素是台灣內部的政治變遷，特別是在認同政治的這個層次上。建構一套鮮明的台灣認同對金門人來說問題很大。眾所皆知，建構台灣認同的歷史要素包括台灣早期的原住民時期、從十七世紀開始的中國移民開發史、1895 到 1945 的日治時期，與 1949 年之後快速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從這個角度看來，金門與台灣鮮有共同的歷史經驗。金門沒有原住民；金門的宗族據說一千多年前就搬到金門島上；日治八年對金門影響不深遠；因為軍事化的緣故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跳過金門。1990 年代之後，金門人愈來愈覺得被台灣邊緣化。台灣獨立的可能性，以及獨立後甚至可能放棄金門主權的想法，形成金門人焦慮的來源。

正是因為如此，昔日有效的記憶論述在台灣政治的變遷下削弱了效果。當苦難論述在 1980 年代開始在政治領域中發酵時，對官方版的歷史相當具有顛覆性。這類論述的支持者都被認為是異議分子而納入黑名單。當然如今對蔣政權的公開批評已不再具有那種直接的顛覆效果。在當代台灣已有許多家庭手工業式的「修正歷史」指出過去錯誤之際，金門之前顛覆性的苦難記憶逐漸變得與當代主流的修正主義歷史，以及台灣的民間記憶趨於一致。因此，原本用來表現出金門獨特性的苦難記憶，其工具性效能已逐漸被抹去。

國民黨重掌政權並未逆轉這些記憶論述逐漸失去效果的局勢，而是改變了失去效果的理由。隨著兩岸關係的正常化與深化，創造金門苦難記憶與英雄記憶的戒嚴時期，逐漸更像是兩岸關係活絡之路（如果不是統一的話）上的絆腳石。因此，對泛藍或泛綠的支持者而言，金門百姓的苦難或英勇逐漸與台灣人無關。在吸引中央政府投下更多資源或制定更優厚的政策方面，也愈來愈沒有說服力。當金門的獨特歷史對台灣來說愈來愈邊緣化，金門的過去也愈來愈不被關心。[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年來種種發展的趨向下第四種集體記憶論述興起，即以惋惜與渴望的態度回頭看戒嚴時期，這是一種懷舊的論述。至少從目前看來，這個論述並非為了政治目的而動員起來，但卻普遍表現在日常生活中。今日人們常常在抱怨過往的軍役之際，也點綴對戒嚴時期生活的正面回憶。這個時段被回憶為人們無私且互相持。「當時地方有難，大家多少出一分力，互相幫忙。」這個相互扶持的記憶也延伸到軍民關係上。「我們向軍人說話，我們彼此幫忙。當要收成的時候，我們請他們幫忙。他們挖壕溝的時候我們也幫忙他們，借他們工具。」這給人一種感覺是：即使生活在無時無刻的軍事威脅下，生活仍然安全穩定。「在那個時代沒有小偷，很安全。交通也不擁擠。人們很團結。」一位前任軍官說，部份原因可能是因為政府的威權，「不像現在，你給一個命令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不同的反應。在那個時候都是一個命令一個動作。」[30] 懷舊論述可以與其他論述互相交錯。所以在回憶起民防自衛隊對地方防禦的貢獻時，洪福田緬懷過去簡單的時光說：「自衛隊員的犧牲奉獻和保鄉衛國的決心從來未變，只是台灣民主化的結果，每一個人強調的都是個人的利益，這股浪潮也開始讓自衛隊員反省，國家加在我們金門百姓身上的任務為身麼這樣沉重？法令上的限制是否合理？國家到底為我們金門百姓做了什麼？我們前線居民為國家犧牲奉獻是否值得？」[31]

懷舊當然不是金門特有；當社會經歷劇烈且不安的改變時，經常會出現對過去的強烈興趣。金門居民懷念過去單純的時光、懷念他們被當成國民模範的時刻。金門民眾的反應跟其他正在經歷劇烈社經轉移或文化邊緣化的團體很類似。Rofel（1994）探討中國國營企業工人的研究中有著類似的回憶：之前他們被視為是國家的英雄，而如今他們在物質上和意識形態上都被置而不顧。如同各地的人們，金門居民同時利用記憶批評過去，或者是肯定過去以批評現代。對戒嚴時期的懷舊反映出對現狀的不滿與對未來的不安，但同時這些記憶也可視為是他們面對當代劇烈的改變，但無法迅速產生新的策略以維持地方利益的困難處境。雖然光靠記憶絕對不可能抵銷金門持續邊緣化局面，但是早期集體記憶論述成功的動員，證明了記憶在政治抗爭中的普遍重要性。不過，這種論述的創造也不能超越既存的個人與集體記憶，以及這些記憶之前經歷的動員。換言之，集體記憶論述亦為記憶的慣性（inertia）所侷限。記憶的慣性意指記憶的創造在某程度與個人與群體的經歷有關，所以它不可能過快的轉變，也不可能如政治行動者所期待的一樣能與新的政治狀況配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　語

集體記憶的論述必然要放在更高層次的政治主張與政治議題中來理解。戒嚴晚期官方的紀念論述是由中華民國政府有意的構建出來，以正當化對金門與台灣的某些特定政策。此時，金門居民也開始拒絕部份官方論述，特別是那些 1980 年代以降官方所強調之共產黨顛覆與間諜滲透的危險，以及接踵而來的戒嚴需要的部份。不過他們並非直截了當的拒絕。戒嚴晚期官方論述中民防自衛隊英勇奉獻的這部份，在 1990 年代早期被金門政治運動者挪用來爭取補償。這些論述因此是官方記憶的變形，而不是民間的以對抗記憶來顛覆官方記憶。以自己的目的來挪用官方記憶需要利用記憶論述中的內部矛盾。也就是說，官方記憶號召人民為國家犧牲奉獻，民防隊服役被解釋為金門人的基本公民義務，如同正規軍隊的兵役為台灣成年男性的基本義務一樣。然而矛盾的是；在台灣徵召的軍隊有薪水給付，金門的民防隊員則沒有。政治運動者主張補償金門的民防隊員，不只是因為公平的原則，同時也是因為無報酬勞工違背了台灣政治經濟名義上的核心原則：經濟自由主義。金門人嘗試以此經濟邏輯對抗政治修辭（political rhetoric），為他們的勞力貢獻要求經濟補償。

當苦難論述被喚醒以支持財產賠償的要求，其相關的政治主張亦與之相似。金門人在要求賠償的脈絡之下喚起受難記憶，而拒絕官方記憶中號召公民為國受難的政治修辭。與此同時，他們也回應或試著運用此刻愈來愈重要的人權修辭。在台灣，這種修辭首先在二二八事件調解的議題上發展起來。如果二二八事件受害者需要補償，金門民眾何以不需要同樣的補償？

這種種論述是「過去」在當代公民權與民主化的運動中被使用的不同方式。在金門，這些運動以補償、交換與公平的修辭形塑。它們因此結合了地緣政治的冷戰修辭與自由經濟市場修辭，並利用兩種修辭間的矛盾之處。因此，支撐這些運動的記憶是某種形式的公民論述，這些論述投射在過去，但是考量的是當代。在金門，民主化與自治化大致被詮釋為一種修正的政治。民間記憶在這種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上述兩種歷史論述的歷史都反映了人在動員集體記憶時一種利益，或者更正確來說 entrepreneurial 的導向。也就是，無論是行動的論述或是受害的論述都在特定時刻為了特定目的而動員。

然而，這種動員的有效性與時遞減。因為這些論述所對話的官方記憶也隨著時間在變化。中華民國的國家與政體並非永恆不變、並非一直是一個同質的整體。在解嚴後，中華民國經歷了戲劇化變化，包括民主化與多黨政治的興起。此時，金門的苦難記憶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隨著二二八事件的平反被重視。但是在二十一世紀兩岸關係緩和，台灣中國互動增加後，國共戰爭的苦難記憶反而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絆腳石。此時苦難記憶也逐漸失去其原有象徵意義。我們看到的是國家，或者國家中的某一部份，開始摒棄前人的一些主張。結果，無論是地緣政治冷戰修辭或是自由主義市場修辭都無法繼續有效地支持金門對中央政府的要求。懷舊論述的興起即反映了金門邊緣化的現況。

以上說明民間記憶的有效性必須放在更大的政治脈絡中來理解。不過，我仍希望強調集體記憶具有慣性（inertia）的特性。也就是說，記憶論述的創造有其侷限，它並不能全然超越既存的個人與集體記憶。

金門過去五十年的歷史確實有它獨特的地方，然而它也有許多可以與同時期其他地方相比較的地方：特別是其他的高度軍事化社會，如琉球，或其他在地緣政治上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地方，如西柏林。也可以與其他分裂國家之邊界地帶，或與其他軍事化與現代化歷程交織在一起的社會做一比較。當金門象徵性地被建構為全球地緣政治的要地，其後續影響之一是這個影像也統合進地方記憶當中，與金門做為受害者的影像並存。無論他們視自己為英勇戰士或是無助的受害者，金門人在當代政治抗爭中運用這些記憶。回顧這個連結或許有助於我們解釋當代政治的特質。Grandin（2004）認為拉丁美洲冷戰的一個主要的後果是：在地方民主的表現中，社會民主被抹除，留下來的乾淨版本將焦點完全放在經濟自由上。在金門，雖然是在一個更地方的層次，冷戰軍事化甚至有更深厚的影響：它帶來的是以補償與修正為核心的民主視野。當這種視野逐漸失效後，所導致的則是近來強烈懷舊情緒的興起。如同一個地方社會持續地與更高層次的國家、區域與全球力量互動，其民間記憶也持續地反映地方人民在當下與這些力量的政治抗爭。

附　註

1. 以上各領域的重要作品包括 Accinelli（1990）；Chen（2001）；Gong Li（2001）；Chang（1990）；Zhai（1994）；Christensen（1996）；Chang（1988）。
2. 感謝 Robert Weller 在 2009 年台北東亞人類學研討會對此點的評論。
3. 一些最近的研究強調同代聯繫在形塑集體記憶的重要性。然而這篇中學老師所寫的長文讓這個論點更複雜，因為在她描述的事件發生時這位中學老師只有兩歲。在記憶論述的政治性運用中，所相關連的世代也許不是處於回憶之事件發生時的那個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代，而是當事件的回憶被策略性動員時政治活躍的那個世代。

4. 感謝本刊的審查者對此點的評論

5. 個人對李善文的訪談。除了公眾人物之外，我的訪談者在這裡用的是假名。我的田野筆記以英文寫成，所以這裡所引用的訪問不是原文，而是從我的田野筆記翻回中文。若資料來自其他學者所作、已經出版的口述歷史，我使用訪談者出版的姓名。

6. 駱建發的回憶（石馬祥等編 2003：37）。

7. 個人對林滿清的訪談。

8. 歐甘目的回憶（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0：162）；吳華亭的回憶（石馬祥等編 2003：28）；陳宗論的回憶（董群廉編 2003：III 86）。

9. 個人對潘樹八的訪談。

10. 洪福田的回憶（董群廉編 2003：I 384）；林火才的回憶（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0：146）；孫炳樹的回憶（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0：141）；個人對蕭生意的訪談；林火才的回憶（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0：145）。

11. 林金樹的回憶（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0：212）；個人對謝祖耀的訪談。

12. 個人對塵愛玲的訪談。

13. 李天宋的回憶（董群廉編 2003 : II 61）。

14. 個人對李玉明的訪談。

15. 個人對潘樹七的訪談。

16. 個人對李釣魚的訪談。

17. 個人對林滿清的訪談。

18. 鄭成達的回憶（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0：180）。這裡的意思為，百姓將已繳交的磚頭,趁阿兵哥吃飯時，偷偷取回，再以此磚頭繳交一次。

19. 陳宗論的回憶（董群廉編 2003：III 82-83）。

20. 個人對葛碧德的訪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1. 個人對潘樹七的訪談（羊試音 2003）。

22. 洪福田的回憶、楊世英的回憶（董群廉編 2003：I 385, I:232；董群廉 2003）；個人對計奎生的訪談。

23. 歐陽金章、楊世英的回憶（董群廉編 2003：III 204, I 229）。

24. 翁水涉的回憶（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0：148）。

25. 吳五全的回憶（董群廉編 2003：II 96）。

26. 個人對陳水在的訪談。

27. 林英局的回憶（林馬滕和呂充在編 2003：179）；歐甘目的回憶（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0：162）。

28. 撤軍背後的因素很複雜，牽涉到冷戰之後地緣政治的轉變與台灣內部的政治變遷（Szonyi 2008：201-206）。

29. 近年來顯著的改變是金門在有條件限制之下開放中國遊客旅遊。既然對大陸的遊客來說，金門的吸引力很大部份來自其歷史重要性，開放旅遊對紀念館中過去的官方記憶論述有立即的影響。如同江柏煒（2007）指出的，紀念館那強調戰勝「共匪」或駁斥共黨宣傳品的展示，在今日就顯得古怪而尷尬。官方的紀念論述變得相當不合時宜。

30. 林火才的回憶（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0：146）；個人對黃愛德的訪談；個人對潘樹七的訪談。

31. 洪福田的回憶（董群廉編 2003：I 396-397）。

引用書目

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0 《金門島上民防隊事蹟及國共戰役調查研究》。金門：金門國家公園。

石馬祥等編

2003 《榮民口述歷史：用生命寫歷史的英雄》。金門：金門國家公園。

江柏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7 〈誰的戰爭歷史？：金門戰史館的國族歷史 vs. 民間社會的集體記憶〉。《民俗曲藝》156：85-155。

羊試音

2003 〈刻骨銘心的八二五〉。《金門日報》3 月 7 日。

洪春清

1993 〈戰地 35〉。《金門報導》22：3。

林馬滕和呂充在編

2003 《細說烽火話烈嶼：從東坑談起》。金門：金門烈嶼鄉公所。

迎曦

2003 〈當年夜幕低垂時〉。《金門日報》3 月 8 日。

翁明志

1994 《浯潮澎湃》。金門：翁明志服務辦事處。

翁雄飛

2003 〈805 部隊的故事〉。《金門日報》10 月 19 日。

陳水在

2001 《金門解嚴》。台北：稻田。

楊樹清

1998 《金門社會觀察》。台北：稻田。

董群廉

2003 〈戰地金門史話〉。《金門日報》7 月 15 日至 10 月 24 日。

董群廉編

2003 《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台北：國史館。

Accinelli, Robert

1996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Bodnar, Joh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92 Remaking America: Public Memory, Commemoration, and Patriotism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ng, Gordon

1988 To the Nuclear brink: Eisenhower, Dulles, and the Quemoy-Matsu Cri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2 (4): 96-123.

1990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en, Jian

2001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i, Chang-hui

2000 The Politics of Deification and Nationalist Ideology: A Case Study of Quemoy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Boston University.

Christensen, Thomas

1996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eary, Patrick

1994 Phantoms of Remembrance. Memory and Oblivion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ong, Li

2001 Tens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the 1950s: Chinese Strategy and Tactics。In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US-China Diplomacy, 1954-1973. Robert Ross and Jiang Changbin, eds. Pp. 141-17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Grandin, Greg

2004 The Last Colonial Massac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lbwachs, Maurice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Lewis Coser, trans a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won, Heonik

2006 After the Massacre: Commemoration and Consolation in Ha My and My L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lick,Jeffrey K. and Joyce Robbins

1998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05-40.

Rofel, Lisa

1994 Liberation Nostalgia and a Yearning for Modernity. In Engendering China. Christina Gilmartin et al, e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zonyi, Michael (宋怡明)

2008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ai, Qiang

1994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